

长江文明史

主编 叶书宗 马洪林 朱敏彦

上海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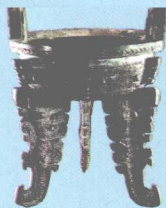


主编 叶书宗 马洪林 朱敏彦

长江文明史

CHANGJIANG WENMINGSHI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文明史 / 叶书宗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1
ISBN 7-5320-7101-4

I. 长... II. 叶... III. 文化史-长江流域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2467号

长 江 文 明 史

主编 叶书宗

马洪林

朱敏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5 插页 12 字数 467,000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本

ISBN 7-5320-7101-4/G·7257 定价:44.00元

序

《长江文明史》即将问世之际，老友叶书宗主编嘱我写几句话。我既有先读之快，理当应命，遂先行说上几点读后体会，以供同好参考。

该书论述所及，上自洪荒，下至今日，分作七个段落，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明”、“长江文明的再开发”、“经济上升时期的长江区域文明”、“文化重心转移时期的长江文明”、“明清时期的长江文明”、“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的长江文明”、“社会主义时期长江文明的新拓展”。每个段落特点鲜明，段落之间紧密衔接，纵览古今，既可见到长江流域先民历经艰辛曲折创造的光辉业绩，也可以看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江流域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龙头，正在日新月异地缔造着远迈前人的伟大成就，历史与现实相呼应，给人许多启迪。

长江与黄河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共同构筑起中华文明。作者客观而充实地论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发展与黄河流域文明的密切关系，写了黄河流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长江流域的转移和传播，也写了长江流域自古以来的对内对外开放，在吸纳、消化先进文明的同时，又创造出更新更高的文明，充实光大了中华文明。因此，有个性（长江文明）、有共性（中华文明），将区域文明置于整体中华文明中间探讨考察，避免了片面性，深化了研究内容。

物质文明是基础，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在服务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促进或影响着物质文明。两者并重，辩证分析，是该书的一大特点。既讲经济重心的转移，也说到文化重心的转移，经济文化繁荣之际，也是社会稳定之时。偏安一隅固非好事，但经济文化的发展，却与偏安形成反差。对这种历史现象作出恰当的分析，也是该

书用力之处。而社会动乱的年代,也就是经济文化遭灾的岁月。前进倒退,曲折迂回,该书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读过该书之后,使我对长江流域文明的发展进程,知其然,也略知其所以然。掩卷而思,得益颇多。

在展现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时候,该书以重墨论证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特色,并极其鲜明地将这一特色概括为:长江文明,就是水的文明。以往,人们都重视“火”在人类祖先生存发育进程中的历史作用,该书与此同时还从长江流域的具体条件着眼,经过缜密地与黄河流域文明的比较,指出长江流域先民对水的认识、利用和治理,与“火”同等重要,水是长江先民创造文明的基本自然条件,水是长江文明的灵魂,并归纳出作为水文明的表现有三:一是它从平衡、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种辩证驱动发展;二是它的吸纳性、兼容性和开放性;三是它的凸现性。就我所知,这是作者比较中外古今文明发展之后的见解,读后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还指出,长江流域文明属于经济型,而不同于政治型,从而也就决定了她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而贯穿全书的一种研究精神,概括说来,就是研究长江文明特征和探讨她在中华文明中的定位,旨在弘扬长江文明,发挥她的优势,为振兴中华,再创辉煌而作出贡献。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我则是读了《长江文明史》,方知长江文明与水的关系的,也望广大读者一阅。

叶书宗教授是我50年代以来的挚友。数十年来,他孜孜以求,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学兼中外,是知名的历史学家。我因耻长几岁,在向老友祝贺新作杀青时,尤盼他以更多的力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增彩。

裴汝诚

前 言

20 世纪下半期以来,长江流域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业已证明,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长江文明也和黄河文明,以及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区域文明一样,既有作为中华文明的共性,又有作为区域文明的鲜亮个性。研究长江文明的生成、发展轨迹、特征,以及它在中华文明中的定位,既是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深化,更是对中华文明的弘扬。



滔滔的长江是大自然一系列神奇的造山运动的成果。如果把长江比作一个自然伟人的话,那么“他”是经过近 2 亿年的“十月怀胎”,直到 300 万年前才降生在神州东南的大地上。长江虽然有大约 300 万年的历史了,但是把长江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区域文明来认识和研究,大概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起步的。

继六七十年代考古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资阳人,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之后,80 年代又进一步发掘了三星堆遗址、马山一号楚墓、楚地曾侯乙墓等古文化遗群,出土了从古人类牙齿化石、头骨化石、古动物骨骼化石,到石器、陶器、骨器、青铜器、铁器、漆器、玉器、丝织品等完整、众多的古文物。1985 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四川省巫山县龙骨坡发掘出一颗人类门齿和一段较为完整的人类下颌骨,以及包括巨猿在内的 116 件哺乳动物化石和三件石器。经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考古学家用最先

进的仪器和手段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 200 万年,比元谋人还早 30 万年,属于人类化石的“能人”化石。1990 年,中国科学院将之正式命名为“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巫山猿人和巨猿生活在一起,说明在长江和三峡形成的初期,猿人和巨猿的祖先就在那里生活了。这一考古发现,将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江流域的活动,推到 200 万年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江流域丰富的考古发掘,成为推动长江文明史研究的基石;突破单纯研究阶级斗争、研究政治史的局限,拓宽研究历史的视野,是研究长江文明史的社会氛围;改革开放,让长江和长江流域发挥中华经济腾飞的龙头作用,是研究长江文明史的时代呼唤。在多种因素的连锁推动下,80 年代以来,有关长江区域文明的研究越来越活跃,成果也愈来愈丰硕。其中像巴蜀文化、楚文化、荆襄文化、两淮文化、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的研究,步步深入,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1991—1992 年,俞晓群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有关长江文化的专著有袁庭栋的《巴蜀文化》和王建辉、刘森森的《荆楚文化》。1996 年,由周稽裘担任主任的江苏区域文化丛书编委会编辑,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江苏区域文化丛书》。已经读到的有王桂芳主编的《金陵文化概观》、许伯明主编的《吴文化概观》、蔡葵主编的《楚汉文化概观》。至于起步较早,研究成果尤为显著的,当然数巴蜀文化、楚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了。

1992 年冬,在武汉举行了长江文化研讨会,这是以长江文化为题的首次学术研讨会。不过,这次研讨会涉及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楚文化的范畴。1996 年底,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18 种、600 余万字的楚文化研究专著《楚学文库》,内容包括神话传记、民族、风俗、科学、历法、建筑、巫术、玄学等各个方面,形成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

1997 年 1 月 6—8 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吴文化研究中心发起,在南京举行首届吴文化研讨会,就吴文化的时空范畴、发展过程、内涵、特性、地位,以及吴文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等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在研讨会的基础上,江苏省社科院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徐采石研究员主

编了《吴文化论坛·1999年卷》(此书已于1999年10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关于吴文化的研究状况,诚如徐采石研究员所说: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格局;成为文、史、哲、经、美、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形成了保护、开发、利用、发展的研究新思路;已有众多研究成果面世,出现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景象。^①1997年12月18—20日,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长江联合发展实业集团公司等单位联合筹备,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在上海市青浦县召开“迈向21世纪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长江沿江城市各单位的70余名专家学者,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三名专家也应邀与会。这次研讨会虽然偏重于经济发展问题,但对长江文明发展的历史成就、特征和现实任务等问题,也进行了总体的认识和研讨。根据与会代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结集编成《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初探》一书,1999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对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区域文明的整体研究也有成果。1995年12月,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学勤、徐吉军两位先生主编的《长江文化史》,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长江文明发展史的综合研究专著。全书分为10章、69节,近100万字,以历史纵向演进为线索,以王朝更迭为序,叙述从远古旧石器时代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170万年的长江文化史。本书的长处是篇幅大,容量多,资料收集比较齐全,历史地展现了长江文化发展的全景。

1996年9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叶书宗、马洪林、朱敏彦主编的《长江文化与中华民族》。此书跳出中国历代王朝更迭的历史年序,摆脱政治史、经济史的传统框架,从长江流域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视角出发,专题式地勾勒长江文化及其演进的全貌。此书的主题是着重

① 见徐采石主编《吴文化论坛·1999年卷》,第9—11页,1999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标示中华文明是长江和黄河的两河文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由于篇幅有限，此书对各种重要问题，无论是在资料上或者论述上，都没有充分展开。

1997年6月，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王杰、王保畬、罗正齐等主编的《长江大辞典》，这是一部以长江的历史、地理、资源、名胜、水利、航运、城乡等为重点的大型工具书，共收词目7367条，200万字，是第一部反映长江流域开发的大型工具书。1997年6月，黄山书社出版了万绳楠教授主编的50万字《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长江流域的认识和研究都在与日俱进。

在对长江流域的诸多研究中，独创一格的是高燮初先生创建吴文化公园。

吴文化公园坐落在江苏省无锡县堰桥乡西高山，占地700亩，是一座以文化历史为内容，以艺术园林为表现形式，以苏（州）、锡（无锡）、常（州）为范围，立足无锡，表现该地区的地域性文化的独特多功能文化园林。走进吴文化公园，让人在赏心揽胜中具体、形象地穿越吴地的历史长廊，领略吴地风光的繁华纪实，展现吴地发展的锦绣未来。吴文化公园还成为吴文化研究的实体和依托，编辑出版了诸如《不了斋碑文集萃》、《吴文化博览苑新闻集锦》、《吴文化知识丛书》等一系列著作。高先生白手起家，创建集文化、历史、园林、实体于一体的吴文化公园，确是研究、弘扬中华文明的一种创造。

二

尽管长江文明研究已有了很大进展，毕竟由于起步较晚，因而仍有不少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书着眼于在展现长江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揭示长江文明的特征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定位。

在中华文明中，作为区域文明的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相比较，从人

文视角来看,其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水的文明。

提供给长江先民创造长江文明的基本自然条件是水。

长江干流长 6300 余公里,是中国第一大河,也是世界第三大河。长江每年入海的总水量超过 10000 亿吨,相当于黄河的 20 倍,差不多占中国河川径流总量的 36%,在世界的名川大河中也排在第三位。长江水系通航的河道有 3600 多条,通航总里程超过 57000 公里,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程的 52.6%。

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南中国,其流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寒夏热,四季分明。长江流域的平均年降水量为 1100 毫米左右,其中的川西降雨区,大巴山西南侧降雨区,湘西北、鄂西南降雨区,赣东北、皖南降雨区,年降水量达 2000 毫米以上。充沛的雨量,湿润的气候,丰富的热量,使长江流域成为亚热带森林生长发育的天然温床。虽经千万年来的砍伐,至本世纪 90 年代初,森林覆盖率仍占全流域面积的 20.3%。不计上游金沙江段,仅从四川省开始,汇入长江的就有 339 条大小支流,连接 149 个大小湖泊,下游三角洲更是世界著名的水网地区。长江流域从四川盆地直至出海口,除山体以外,基本上都在海拔 600 米以下。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岂止是为人类提供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条件,它是为长江人提供一个创造具有水的蕴含、水的气质的水文明的环境。

长江文明是由水来滋养的,甚至可以说是用水养起来的。

远古的人走过漫长的茹毛饮血阶段,过渡到定居生活,首先要解决固定的饮食来源。长江流域发现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像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都已有大面积的炭化稻谷堆积层,经测量,谷粒的大小也接近当今的谷粒。据此推测,当时的稻谷亩产可能达到 200 来斤。马家浜文化还发现有加工谷物的陶杵。崧泽文化遗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石犁。良渚文化遗存出土的农具,除石犁以外,还有石耘田器、半月形双孔石刀,一种最原始的镰刀。这些考古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时代,稻米已是

长江先民的主食了。

长江先民的副食，主要是取自江河湖泊的鱼虾。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都有鱼骨、蚌壳、鱼骨器具、捕鱼器具等各类化石，装饰品也有鱼虾图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以鱼殉葬，有的甚至让死者的口中衔鱼。这些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以稻米为主食，副食中鱼虾占很大的比例，已成为长江先民的基本饮食结构，它一直贯串到今天。这样的饮食结构，世代代形成长江人的身体条件和智力发展条件，影响创造文明的思维方式。

人类的生存，除饮食之外就是衣著。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提供了养殖桑、蚕的优良条件。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先民已经知道采桑、养蚕了。属于马家浜文化的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三块已炭化的葛布残片，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织物，测定是织绢。到了战国、两汉时期，纺织技术已非常高超、神妙了。

长江文明带的各区域文明，又是由水来连结的。水的连结也构成水文明的特征。

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与黄河流域不同。黄河流域从关中平原到华北大平原，即中华文明的腹地地区，基本上是连成一片的。因此，黄河文明带的各区域文明，共性突出，连语言、风俗习惯都相近。长江流域姑且不说上游金沙江段，即从中游的四川盆地、汉中盆地、江汉平原、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皖中平原、太湖平原，以及出海口的三角洲平原，各盆地、平原之间，都有高山深谷、河流湖泊阻隔。因此，各个自然地域就创造各具地域色彩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三湘文化、两淮文化、吴越文化，以及近代以来形成的海派文化，等等。

在交通工具原始、交通不便的古代，平原、陆地之间的相互联系，大大优越于山川阻隔的地区。长江文明带的各区域文化，主要依赖水来沟通，由水来连接。因此，水是长江文明带互相驱动，连成一体的纽带，依赖水、歌颂水、崇拜水，几乎是长江文明的共同意识。

水上的运载工具是舟船。毫不奇怪，造船技术、工艺，航运业和水

上生活就成为长江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蒸汽轮船发明之前,长江沿江城市的造船业和航运业,一直是世界的领先者,水上文化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独秀的一枝。

长江文明发展的脉络,或者说长江文明发展的阶段,是以对水的认识,对水的治理,对水的利用,对水的驾驭为标识的。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驾驭水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大致上标示着长江文明发展的递进水平,这是判定长江文明作为水文明的又一重要标识。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明火的使用、控制当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实际上对水的认识、利用、治理、驾驭,也有与使用火那样同等的意义。可是,由于水是大自然慷慨的赐予,而且水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突破性意义,不像火的发明与使用那么表现出爆炸性的影响,因而,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时,就比较地看重火,相对地忽视水。其实,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从某种角度看甚至比火更加重大。近代大西洋两岸的发展与领先,就是认识水、驾驭水的领先。我国从南北朝开始,经济重心南移,到了两宋时期,又确立了南方文化重心的地位,就是由于水提供了自然条件,是长江人对水的认识、治理、利用、驾驭达到新高度的结晶。

因此,可以说:水是哺育长江文明的乳汁;水是培育长江文明的环境;水是长江文明的灵魂。

长江文明作为水的文明,它的表现之一是从平衡、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种辩证驱动发展。

长江文明作为构成中华文明的区域文明,它和黄河文明之间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种辩证的驱动发展,交汇成多元的中华文明。

前文已经提到,巫山猿人的发现,把长江流域人类的活动推到 200 万年之前,巫山猿人是创造长江文明的最早先民,河姆渡人则是 170 万年之前的长江先民。

继巫山猿人发现之后,1993 年春,在南京市东郊汤山镇的一个山

洞里,发现了男、女各一的两具人类头骨化石。经测定其生活年代大约距今 30 万年,成为远古洪荒时代长江下游人类生存活动的纪录。

1985 年,在太湖中的三山岛(属江苏省吴县)发掘出 1 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 5263 件,证明旧石器时代长江先民已有相应的发展。至于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有大面积的,上自四川盆地,下至下游三角洲的连贯的考古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像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都达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辉煌。江苏省吴县草鞋山出土的玉琮、大玉璧,武进县出土的大型玉琮,年代之古远和琢磨之精良,是迄今为止世界出土文物中仅见的。

但是,到了青铜器时代,即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长江文明相对于黄河文明来说,却沉寂了,落后了;黄河文明在这个时期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主干,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太伯东迁时,长江三角洲地区还处于断发纹身的阶段,被黄河文明称为“蛮夷”。直到汉末、三国时代,长江文明经历了一个再开发阶段,南北朝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移到南方。宋以后,中国文化重心也移到南方。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就是这样互相催动,交融为多元的中华文明。

自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文明以来,世人在惊叹它的辉煌成就之余,也产生一个极大的疑问:它为什么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沉寂了?学术界也根据已有的资料,进行种种诠释。李学勤、徐吉军两位先生主编的《长江文化史》认为,长江文明从夏代开始衰落,一是三苗民族在与北方民族的长期战争中败北;二是由于特大洪水的冲击。

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是不够的。因为在石器和金石并用时期的战争,无论持续时间有多长、规模有多大,其杀伤力和破坏力都是很有限的,不会造成全局性的灭绝。何况至今为止已发掘那么多的长江先民活动遗存,从未发现过类似“万人坑”那样的集体、群体屠杀遗存。因此,以三苗民族与北方民族在战争中败北为由,不足以解释长江文明的沉落。

特大洪水冲击也不足以解释长江文明的沉落。因为至今为止,没有考古发现能证明金石并用时期以后,从四川盆地到长江下游平原地区,全变成泽国。而且,在发现长江先民活动遗存的盆地、平原地区,附近都有山地、丘陵,人类的防范本能不至于统统让洪水淹没,而不向山地转移。整体被毁有记载或考古发现的,仅有 1680 年夏秋,黄河、洪泽湖决堤,将洪泽湖畔的泗州城淹于洪泽湖底,除此之外,再无东方的“庞贝古城”发现。

要解开长江文明在夏商周三代相对落后之谜,还要从长江文明是水的文明这一特征上去寻找答案。

应当看到,哺育长江文明的稻谷种植,无论对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旱地粟作种植。

太湖中的三山岛发现距今 1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出土石器 5263 件,证明这些地区主要过着捕鱼、采集生活。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是新石器的辉煌时期,已出现石犁、石耘田器、有柄石刀等农具。南京金川河、秦淮河及长江两岸发现 3000 年前的古文化遗存,被定名为湖熟文化,出土大批青铜器,基本上是青铜箭簇和鱼钩,而没有青铜农具。武汉市北郊发掘的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也是礼器和兵器。四川省彭县竹瓦街出土西周初期入藏的大批青铜器,也是礼器和酒器。令世人惊叹的广汉三星堆遗存,出土的青铜器有 400 多件,基本上是礼器、人物和动植物形相。1959 年,邳州胜阳山梁王城遗址出土古徐国(西周初)青铜盆,就是不见农具。

当然,长江流域已进行过的考古发掘,并非绝对没有青铜农具。1989 年,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有犁、耒、耜、铲、镰等农具 10 种。1993 年,邳州清理九女墩墓葬,出土青铜器 307 件,除大量的兵器、礼器、乐器、车马器具之外,还有 21 件生产工具。

从这些丰富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长江流域从远古时代到旧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200 万年来的历史是延续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大量的、品种多的石器农具,但是到青铜器时代,却绝

少青铜器农具。这就说明长江文明到青铜器时代衰落了,出现这样的起伏的重要原因是青铜器的代价太高,而硬度又相对地低,不宜制作农具。长江流域的土壤基本上是粘土,水稻种植又是水作,不能推广青铜农具。因而在石器时代过去之后,没有相应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导致经济衰退,文明滞后。因此,长江文明不能像黄河文明那样即使也少青铜农具发现,但是黄河流域是松软的黄土,又是旱地粟作,即使没有青铜农具,也能进行粟作劳动,也能创造领先世界的青铜器文明。

青铜器时代长江文明沉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水稻种植要求有较高的水利灌溉,而青铜器时代的长江先民,还没有创造出有效的水利灌溉技术,不能修建能较大面积进行农田灌溉的水利工程,使水稻种植无法摆脱原始状态。生产的落后导致文明的衰退,因为经济的沉落既是文明沉落的原因,又是文明沉落的必然趋势。

古史传说,夏禹曾在太湖治水,使太湖和长江的水流入东海。即使这种传说并非臆测,也只能说明夏禹是疏导泛滥的洪水,并无农田灌溉功能。3000多年前太伯从陕西奔吴,率领荆蛮开掘伯渚港,成为江南地区的第一条灌溉人工河渠。春秋时期,楚庄王属臣孙叔敖在淮南兴建期思陂,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早期陂塘围堰水利工程。伍子胥开胥溪,吴王夫差开邗沟,春申君治黄浦江,楚国在安徽寿春兴建芍陂,引水灌田。这些工程在当时堪称是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了。中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综合治理工程,是公元前277年前后的战国末年,秦国蜀守李冰完成的都江堰。考古研究表明,早在李冰之前,蜀人已开始治理岷江,是李冰加以综合完成。从这些史籍记载中可见,农田水利灌溉事业,大体上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已经普遍使用了。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了水利灌溉的综合性工程,使以种植稻谷为主的长江流域经济跨上新台阶,长江流域文明也开始再兴盛。

因此,应当把长江文明在青铜器时代衰落的原因,归结为是青铜器不适合制作农具,以及尚未达到人工灌溉的耕作阶段,这是作为水文明

的长江文明难以避免的曲折。

此外还应当分析,在古史研究中通常所说的青铜时代长江流域相对落后于黄河流域,究竟落后在哪些方面?

在夏商周三代,黄河流域已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机关,形成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宝塔式王权统治政治格局。与宝塔式的王权政治格局相适应,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完备的礼仪、伦理道德体系。相比之下,长江流域仍然是各自分割的,各地域之间依旧鸡犬之声相闻,自耕自食,互不相侵,过着“村社式”的社会生活。由于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因而也形不成社会一致认同的礼法和伦理道德体系。社会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散性,还直接影响文字和记载方面的落后。

青铜时代长江流域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方面的落后,还和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有关。长江流域的各地域之间,大多被高山深谷、河流湖泊所分隔,这种自然条件不利于相互交往,但是有利于相互之间的防范和自我保护。黄河流域的大片地域都是一马平川,为了防守和保护,发展起筑“城”防御;“城”最初是由防守功能发展起来的。在古代,平原地区只有筑城才能防守。而在长江流域,除了那些作为京师、建都的大邑,以及险要的关隘之外,一般集镇筑城都较晚。至于东南沿海的有些集镇,甚至到明代为防倭寇骚扰方始筑城。

青铜时代的长江流域,虽然没有建立起像黄河流域那样的统一的中央政权机关,没有形成相应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但是在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却并不比黄河流域落后多少。长江流域在政治体制、法制程序、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和黄河流域的差异,是因为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 and 经济生活条件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即使在青铜时代,被中原腹地称作“断发纹身”、“蛮夷”的长江流域,并不是绝对的落后,而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不同,因而在社会政治生活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和黄河流域有所差别。把“断发纹身”理解为绝对的落后,显然是不确切的,应当理解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在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表现之一。

作为水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表现为长江流域各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虽然同属新石器时代文化，但时间跨越二三千年来，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到后期的金石并用时期，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从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到出现早期的贫富差别现象，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存是公元前 2700—900 年的文化遗存，出土上千件文物，包括磨制的石斧、石凿、薄胎陶器和工艺陶器、纺轮、玉器、青铜器、金器。这上千件文物，最为世人惊叹的是青铜器和金器。400 多件青铜器分为人物、礼器、动植物形器等三大类，工艺精湛。出土的金杖是用纯金皮包卷木芯而成，长 142 厘米，重 500 多克，顶端有戴王冠的人头像和鱼、鸟、树叶等图案。三星堆遗址是一座东西长约 2000 米、南北阔约 1500 米的古城，残存的城墙还有近 2000 米。三星堆遗存的发现，说明当时已达到很高的文明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是周成王时熊绎被封于楚，至公元前 223 年被秦所灭，前后约 800 年间楚国所创造的文化，蔚为壮观。春秋时期，吴王阖闾迁都于姑苏，扩建成城周 47 里的阖闾大城，雄踞诸侯之首。西晋永嘉之乱（307—312 年），中国人口首次大规模南迁，为江南地区带来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繁华的代表。

长江文明作为水文明的表现之二是它的吸纳性、兼容性和开放性。

长江文明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的繁华、青铜器时代的沉落之后，到铁器时代的再开发，每一个发展，每上一个台阶，几乎都吸纳别的区域文明。

巴蜀文化、楚文化的遗存发现，都明显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吸纳中原文明的成果。

公元前 11 世纪的商末周初，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从陕西来